

蒋梦麟 著

西潮·新潮

蒋梦麟回忆录

蒋梦麟 著

西潮·新潮

蒋梦麟回忆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潮·新潮：蒋梦麟回忆录 / 蒋梦麟著.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133-2303-1

I. ①西… II. ①蒋… III. ①蒋梦麟 (1886-1964) — 回忆录 IV. ①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8902 号



传记文库

新潮·新潮：蒋梦麟回忆录

蒋梦麟 著

策 划：彭明哲

责任编辑：杨英瑜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阳洪燕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660mm×970mm 1/16

印 张：27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6年10月第一版 201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303-1

定 价：5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蒋梦麟：西潮、新潮与现代中国

马 勇

大多数中国历史研究者相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具有成熟的政治架构和丰沛的思想文化基础，有着自己的发展理路，假如不是西方势力东来，中国必将在固有架构中长此终古，历史终结。五四新文化运动晚期，东方文明受到西方文明严峻挑战，但东方文明信仰者梁漱溟依然信心满满：“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地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①然而，历史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卷一，第39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没有像梁漱溟等人假设的那样各走各的路。西方在走出中世纪之后，经过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经过大航路发现、工业革命，西方迅速解决了人类期待很久的富裕物质生活，同时也带来新的困扰：市场狭小、产能过剩，因而我们看到至少在十六世纪中期，西方物品开始向全球输出，寻找更大市场，更便宜的劳动力，更多的利润。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古老的东方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潮”的冲击，国家、族群与个人，差不多都在西潮冲击下重组、重构，并最终获得了新生。我们在这里将要说到的蒋梦麟，就是西潮冲击背景下走上现代的第一代领跑者。

蒋梦麟有两本著名的自传，即本书汇集的《西潮》与《新潮》。最近二十年，国内知识界对这两本书已有很多了解，通过这两本书知道蒋梦麟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农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蒋梦麟写得匆忙，参考资料也不多，因而漏记、误记在所难免，本文只是力所能及提供一些缺失的环节。

西潮冲击下的国家与个人

蒋梦麟生于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换算成西历为1886年1月20日。但从农历即中国传统纪年方式算，光绪十一年大致对应公元1885年。因而有的文献说蒋梦麟生于1886年，有的说生于1885年，都没有错。

根据蒋梦麟回忆录《西潮》所说，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梦见了一只熊，以为吉兆，故而为这个新生儿命名为“梦熊”。梦熊后来读书时因参加学潮不方便继续使用，遂更名为梦麟。^①梦麟有时又写作梦邻、孟邻，或梦磨。

^① 蒋梦麟：《西潮·新潮：蒋梦麟回忆录》第14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蒋梦麟算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文化领域中极具个性的人，他的性格、为人，与其生存环境、乡土文明无疑具有因果关联，值得注意。他的家乡为浙江余姚，那里因五口通商最早受到“西潮”影响。蒋梦麟的祖父早在道咸时期就在上海开了一个钱庄，积累了一些家产。不幸的是，蒋梦麟的祖父在盛年时伤了一条腿，后来严重到必须截肢的程度。而更不幸的是，蒋祖父竟在这次截肢手术过程中因血液中毒而辞世，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即蒋梦麟的父亲蒋怀清。

怀清公继承了乃父留下的七千两银子，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财产。只是怀清公年龄太小，无依无靠，只好将这些银子交给未来的岳父去打理。

蒋梦麟的母亲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容貌美丽，能歌善吟，多才多艺。可惜，蒋母在蒋梦麟很小时候就去世了。

像传统中国社会一切有经济条件的家庭一样，蒋梦麟大约五岁时就被送到私塾读书，所读内容也都是传统士大夫早年必修的儒家经典，学习的基本方法就是死记硬背，学习的目标就是科举考试。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是传统士大夫的全部人生，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唯一出路、必经之地。

读过几年私塾，蒋梦麟的知识已有一些积累，年龄也渐渐大了。大约 1897 年的时候，怀清公将他送到刚刚开办的绍兴中西学堂学习。

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是蔡元培。蔡元培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影响蒋梦麟生命历程最重要人物之一。中西学堂课程设置像其名字一样中西合璧，既有中国传统经学、文学、史学，也有英文、数学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①这是晚清教育改革发生后的新气象，从而使蒋

^①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 69 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三十六，1976 年。

梦麟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外，也系统接触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

1899年秋天，蒋梦麟的家乡因水患而发生了可怕的匪患，几百年来宁静的乡村由此而变得骚动不安。怀清公为躲避匪患将全家迁往上海，蒋梦麟被安置在一家天主教学校继续学习英文。在上海这段时间使蒋梦麟直接感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好处，使他看到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内在缺陷。

蒋梦麟家乡的匪患，其实与北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有很重要关联，是中国政治又到了一个多事之秋的象征。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因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强力镇压而向四方扩散，直隶首当其冲，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也不宁静，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沿海一带相当恐惧。这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开关以来，特别是《马关条约》以来，各国在那儿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根据汇丰银行当时向英国外交部提交的报告，当时英国国内退休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依靠从上海的财产获益中生活，每年从一百镑到三万镑不等。因此，如果在上海或长江流域发生大的灾难，英国在中国的投资势必要打水漂，许多英国家庭都会因为上海的陷落而蒙受巨大损失、痛苦。^①因此当清政府将向列强宣战的消息传来之后，不论中外，迅即陷入高度恐慌。为避免战乱，怀清公连夜举家撤回故乡蒋村。不久又迁往余姚县城，蒋梦麟被安排在县城一所中学继续读书。

在余姚县城中学，蒋梦麟只待了一年左右，之后只身来到省会杭州。他那时大概已有出洋留学的想法，因而希望找一所比较好的教会学校继续学习英文。不料蒋梦麟对杭州的情况实在不太了解，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一所非常糟糕、落伍的教会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具有极端宗教狂热的传教士，他除了知道向学生强制灌输基督福音，

^①《汇丰银行致外交部函》（1900年7月29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47页。

对西方文化如何传入中国，中国学生怎样才能掌握理解西学，从来都不热心。

不久，在各地风起云涌学潮感染下，这所学校的学生与学校当局发生激烈冲突，全体学生一致退学，自行筹办了一所学校，并请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命名为“改进学社”。这些学生的想法非常简单，他们渴望这所学校办得像牛津、剑桥一样出名。这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到半年，学生的自治试验宣告失败，蒋梦麟趁着这个机会进入浙江高等学堂继续学习。

浙江高等学堂是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浙江省最高学府。蒋梦麟在那里不仅学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而且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各式各样的新思想。蒋梦麟的思想境界为之一变，并渐渐形成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自己的未来前途也有了不一样的考虑。他此时又觉得，出国留学并非首选，要想在中国出人头地，可能还得头悬梁锥刺股，像历朝历代士大夫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然后踏入仕途，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基于这样的判断，蒋梦麟在革命、改良如此高涨的气氛中，毅然坚定地复习科举考试的内容。

1903年，十七岁的蒋梦麟返回家乡参加考试，如愿以偿考中了秀才。秀才只是科举考试的最初门槛，要想达到科举考试的顶端进士、状元，刚刚踏入门槛的秀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蒋梦麟在中了秀才之后很快返回浙江高等学堂，继续在那里接受学堂教育。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处在急剧变革的时期，各种可能随时都在发生。当蒋梦麟中秀才的时候，中国知识人上升道路已在发生变化，科举考试不再是青年知识人的唯一选择。那时，不仅朝廷鼓励年轻人出洋留学，学习东西洋的新知识，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在那些年的发展，一批“先富阶级”也有力量将子女送往国外读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下，原本期待中进士、点翰林的蒋梦麟在1904年上半年几经犹豫又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那一年暑假，他只身来到上海，参加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期望在南洋公学为自己打好一个西方文化的基础，以便将来留学美国。

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创办的洋务学堂，专门培养洋务人才。南洋公学预科按照美国中学学制设置、管理，其教学、分数等，也与美国的一些大学对接。因此可以说，考上了南洋公学，也就等于敲开了美国一些大学的大门。

在南洋公学，蒋梦麟待了两年时间。这两年，主要是英语的训练，为进入美国大学做准备。经过两年准备，蒋梦麟于1908年暑假回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不幸名落孙山。

落榜后的蒋梦麟并没有放弃留学的想法，毕竟他的家庭在过去几十年有些积累。蒋梦麟向他父亲怀清公要了几千元钱，自费留学美国。当年9月，蒋梦麟抵达美国，错过了当年秋季入学的日子，只好就便请了一位学生帮助补习英语。第二年（1909）春，蒋梦麟获准进入加州大学农学院。

蒋梦麟之所以选择农学，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认为，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么当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之后，中国更应该改进农业，让农业复兴，乡土重建，农民富裕。只有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得到落实，中国人才能真正获得温饱、尊严与幸福。另一方面，蒋梦麟的幼年毕竟在乡村中度过。耳濡目染，蒋梦麟对田野自然风光、适宜的乡村生活有着深情依恋，对农业技术改良有着浓厚兴趣。此外一个比较实在的考虑，那就是蒋梦麟自幼身体羸弱，他想如果能常年在田野中接触新鲜空气，对他并不健壮的身体一定有莫大好处。

在农学院一个学期，蒋梦麟一直兴致勃勃，也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半年后一个偶然机会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一位朋友劝他改行，

力主学一门社会科学。这位朋友的理由是，农学固然重要，但从中国实际情况看，目前最需要的似乎并不是农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除非中国能够参酌西方国家近代发展的经验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的农业在中国政治转型完成之前，不可能单独凭借技术进步获得发展。这位朋友的第二个理由是，如果不改修社会科学，那么眼光必然狭隘，只局限于实用科学小圈子里，无法了解农业之外的重大问题。在这位朋友看来，中国农业式微并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社会的、政治的因素远大于技术。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留学生对外部世界有了自己的观察，他们普遍有了改造社会，甚至改造国民性的想法，因而那时的留学生不愿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面下功夫，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确实不在少数，胡适、鲁迅、郭沫若等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朋友的建言不能不引起蒋梦麟的思考，并促使他下定决心，从190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改学教育学。这是蒋梦麟求学生涯的一个大转折，由此也让他后来具有从事教育、农村复兴的双重理由。

1912年，蒋梦麟完成在加州大学的学业，前往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师从杜威教授，继续哲学及教育学的研究。杜威是那时美国最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哲学家，他对现代中国教育及哲学发展影响极大，其主要的因素就是他招收到了蒋梦麟以及胡适、陶行知等几位后来极负盛名的中国学生。当然，杜威教授本身的学术成就是第一位的，也是这几位中国学生拜师学艺的前提。

追随杜威教授，蒋梦麟在哥大研究院苦读了五年，像他毕生最紧密的同学、朋友胡适之一样，蒋梦麟也没有在西方哲学、西方教育方面选择研究方向。经过几年努力，胡适之选择以西方哲学重解中国古代哲学为学术发展的基本路径，而蒋梦麟，则以西方哲学、教育学理论重新解释中国古代教育，以《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为论题，于

1917年6月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一系列程序，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蒋梦麟在美国读书的这几年，正是中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本来以大清帝国臣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可是现在大清王朝已成为历史陈迹。中华民国虽然经过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挫折，但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已成为中国人的唯一选择。在那几年中，蒋梦麟因机缘巧合认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指导下，他曾连续三年边读书边参加革命党《大同日报》的编辑、撰稿工作，用实际行动支持故国的进步发展。

现代教育开拓者

完成在美国的学业后，蒋梦麟马不停蹄、风雨兼程赶回祖国，在家乡停留短暂时光，就如约前往上海，接受黄炎培的聘任，在江苏教育会做事。江苏教育会是当时东南中国一个最有实力、影响力的机构，黄炎培自清末以来，为南部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

1915年春，黄炎培以《申报》记者和旅美实业团编辑的身份参加农商部组织考察团前往美国，实地考察美国在实业及实业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并参观在巴拿马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代表团于1915年4月9日启程，8月25日归国。此四个半月的光阴，耗于途中者一个半月，漫游美国全境者两月，留旧金山观博览会者一个月。在这漫长旅途中，所至之处差不多都有中国留学生主动陪同，而蒋梦麟就在这个过程中与黄炎培结识，并获得黄炎培的信任与器重，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了蒋梦麟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

蒋梦麟与黄炎培接触的具体日期及详细过程，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至少1915年5月12日黄炎培在旧金山参观考察教育行政情况时，蒋梦麟向黄炎培提供了一份《美国加利福尼亚省教育行政制度

一览表》，以自己调查所得，详细介绍了加利福尼亚的教育体制、行政设置、学区制度及教育税的征收、使用等方面的情况，深获黄炎培赏识。黄炎培在当天日记中说：“蒋君梦麟，留学加省有年，知余方研究彼省教育行政制度，乃以其调查所得，制表见示。”^①从这个语气可以感觉到黄炎培与蒋梦麟可能刚刚见面，即便他们可能在此之前有过其他某种形式的联系。

结识黄炎培，是蒋梦麟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机缘。黄炎培与蔡元培，构成蒋梦麟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靠山。因为蔡元培，蒋梦麟后来成为北大最杰出的校长之一；此时因为黄炎培，蒋梦麟以江苏教育会的工作作兼差，同时进入商务印书馆，寻找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收入并不太菲薄的工作机会。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老的出版机构，成立于1898年，创办人和此时的主持人为极富学识的生意人张元济。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商务已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文化重镇，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商务主办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最为畅销，引领当时的思想潮流。

蒋梦麟因黄炎培的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②，商务也有借他的留学经历、教育背景，尤其是其人脉资源开拓一些新的事业。在商务，蒋梦麟受张元济的委托制定过西方名著的翻译计划^③，尽管这个计划后来并没有由蒋梦麟执行下去，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蒋梦麟的计划可能是后来的商务持续编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起点。

繁忙的编辑、组稿之余，蒋梦麟也给商务《教育杂志》撰写有关新教育的文章，并在大上海各种公开场合发表演讲，传播西方近代教

① 《黄炎培日记》卷一，第166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

② 《张元济全集》卷六，第1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③ 《张元济全集》卷六，第272页。

育的新思想与新办法，推动中国新教育的萌生与发展。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不太合乎蒋梦麟的个性，同时因为江苏教育会的事务也牵扯他许多的时间与精力，尤其是江苏教育会联合北京大学等单位有意创办一份《新教育》月刊^①，需要蒋梦麟全身心投入，于是不到一年时间，蒋梦麟就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全身心主编《新教育》月刊。

《新教育》“以输入世界最近教育思潮、学术新知，传布国际大事为宗旨”；以“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为目标。^②创刊仅六个月，就发行到一万份，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在主编《新教育》的时候，蒋梦麟所撰述的文章大都充满新思想新意思，深刻影响国内思想界，展现了他对“新青年”“新时代”的期许、愿景。他强调，凡一个时代大潮的到来，终逃不了两个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环境变迁速度确实太快，没有新学术以供给适应其需要，结果社会的病就一天一天的重起来。所以我们要讲新学术去救它。这个新学术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预备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扫荡全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蒋梦麟指出，我们因为有这个目的，所以不要青年在一担一桶水里费尽心力；他像陈独秀当年在《敬告青年》中所期待的那样，希望青年决百川之水！这决百川之水的方法是什么呢？

一、愿青年自己认作富于感情、富于思想、富于体力、活泼泼的一个人。

二、愿青年用活泼泼的能力，来讲哲学、教育、文学、美术、科学种种学术。

^① 黄炎培来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11日。

^② 《新教育月刊出版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6日。

三、愿青年用宝贵的光阴，在课堂、图书馆、试验室、体育场、社会、家庭中作相当的活动。

四、愿青年抱高尚理想，望那理想中拼命做去。

五、愿青年多团体的活动，抱互助的精神，达到团体的觉悟。

蒋梦麟说：“青年青年，你们自己的能力，就是水；运用千百万青年的能力，就是决百川之水；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作文化的运动，就是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泻千里，便成怒潮——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①

蒋梦麟为《新教育》投入了全部精力，《新教育》影响的扩大也为蒋梦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新教育》创刊原则、办刊思想，与当时国内知识界风起云涌的新文化新思想若合符节，因而很自然地与新文化重镇北京大学的新派知识人建立知识上的紧密联系，从而使蒋梦麟在《新教育》发刊第二年，就义无反顾跳进这个新知识新文化的大漩涡，兼职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讲教育学及教育史。

兼职北大教授，当然是因为蒋梦麟在《新教育》杂志的影响，另外两个直接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即他既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得意门生，又与当时北大明星教授胡适不仅同为杜威的学生，而且交情甚笃，政治理念、教育主张也相当一致。更重要的是，蒋梦麟因为蔡元培，因为五四运动的机缘，成为北大不可或缺的一员。

陈独秀的《新青年》、蒋梦麟的《新教育》，还有其他类似的新刊物，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为了给新文化运动提供外来思想资源，那时许多新文化机构、学人，想方设法邀请世界知名学者来华访问、系列演讲，传播西方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梦麟的恩师杜威教

^① 《新文化的怒潮》，《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5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授旋风一样地影响了中国。

1919年3月，正在日本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陶孟和在那里遇见正在东京大学讲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杜威，谈话中提及能否到中国访问讲学的事情。杜威对此很有兴趣，他也确实希望有机会访问东方这个神秘国家。

陶孟和将杜威的这个意思向胡适作了转达^①胡适很快与相关单位联系，迅即与陶行知等人相约去信邀请。陶孟和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还专程拜会杜威，当面表达这个愿望，并希望杜威能够将访问时间延长至一年左右。这个建议使杜威非常高兴，他表示如果中国的大学能够与他所服务的哥伦比亚大学协商妥帖，他个人乐于这样做，因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旅行很难看出什么道道，如果能够给他一年时间，他或许能够对“中国问题”有所建言。^②

杜威访华计划确定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杜门弟子开始忙了起来，他们紧锣密鼓撰写出一批鼓吹杜威教育思想和哲学理念的文章发表，并举行几次公开演讲，将杜威教授的哲学理念、教育思想作了一个比较通俗的介绍。^③同时，他们还决定对杜威文章、演讲稿的翻译一律使用白话，以尽可能地扩大传播范围。^④在杜威抵达上海前，仅蒋梦麟一人就在《新教育》杂志一次刊载两篇文章，即《杜威之人生哲学》和《杜威之道德教育》^⑤，还撰文介绍《杜威的伦理学》。

4月30日午后，杜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一起乘船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前往码头迎接，然后将他们送到沧州别墅住了下来。此后几天，就由蒋梦麟、胡适等分别陪同在上海参观游览。

① 《陶履恭教授致胡适之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7日。

② 《杜威博士致胡适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8日。

③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二，第34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

④ 蒋梦麟致胡适函，《胡适秘藏书信及函稿》卷三十九，第416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⑤ 均见《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

5月2日晚，胡适与蒋梦麟商量后函请蔡元培商请教育部向哥伦比亚大学发一正式电，希望哥大同意延长杜威在华讲学时间。^①也是在5月2日晚，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旨意，为杜威明天开始的正式演讲预热，“开辟出一条道儿”，以为导言，讲了科学律令、生存进化、方法论、真理论、实在论等。^②

5月3日，下午二时许，杜威教授在江苏省教育会正式开始他中国之行的系列演讲，题目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江苏省教育会是蒋梦麟此时的工作单位，他又是杜威教授的入室弟子，所以当天的演讲理所当然由蒋梦麟担任翻译。这个题目在当天的演讲中没有讲完，第二天下午继续进行，依然由蒋梦麟翻译，听者之众，几乎无席可容。至四时许结束。晚间，教育会设宴款待杜威一行，蒋梦麟、胡适都在这次宴席上，他们谈笑风生，意气风发，谁也不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赵家楼和北京大学在5月4日所发生的事情。这场后来被命名为“五四运动”的大事件，被许多人视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③，从一个比较纯粹的思想启蒙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④这场思想启蒙—文化革新—政治变革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扭转了历史方向，也改变了杜威的访华行程，更因此而改变了蒋梦麟的人生轨迹。

① 《胡适致蔡元培电》，《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

② 《晨报》副刊1919年5月10、11日。

③ 欧阳哲生编：《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卷一，第3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

“遣代案”：替蔡元培掌印

五四运动发生之初，在上海的蒋梦麟虽然同情学生，支持蔡元培，但他并没有拿出很多的精力投身于这场运动，因为清末以来的学潮此伏彼起，让人无法在一件事上持久关注。直到6月，蒋梦麟在《新教育》发表《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终于意识到了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政治未来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对五四运动极为推崇，以为“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的感情，解放的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这样 gone 去，我心目中见那活泼的青年，具丰富的红血轮，优美和快乐的感情，敏捷锋利的思想，勇往直前，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凡此等等，若非从基本上改变生活的态度做起，东补烂壁，西糊破窗，愈补愈烂，愈糊愈破，怎样得了！”^① 蒋梦麟的这些分析对后来的五四思想文化研究影响深远。

一场民族主义抗争的学潮引发了政治上的大地震，持续两个月的学潮甚至开始向市民、工人阶层中扩散。究其原因，除了政治活动家的活动、鼓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洁身自好的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愤而辞职，不告而别：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②

蔡元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教育家，是新教育新思想的标志性人物，北京大学在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影响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新旧转轨复杂时期，

^① 《改变人生的态度》，《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23页。

^② 《蔡元培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0日。